

·会议综述·

“中国重大战略性人口科学与政策问题”研讨会综述

尹文耀

2014年9月9~10日,“中国重大战略性人口科学与政策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近3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人口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相关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人口理论问题的讨论

(一) 人口学的理论研究

针对社会学者对人口学理论的质疑,有学者认为,人口学更多的是以数字和统计事实说话,而社会学则更侧重于理论解释与理论建构。人口学有很好的描述理论、预测理论,但人口描述、预测不能解释人口自身现象和变化,解释人口现象和变化需要借助于其他学科,因此需要将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的理论引入人口学。人口学本身不乏各种形式的理论。一种是描述性的理论,如人口转变理论,是对某种人口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概括和解析,是长期经验总结形成的;另一种是数学模型,是典型的形式人口学理论,用数学公式或方程进行表述,如稳定人口理论,是对人口变量之间关系的确定性表述。还有一种理论是基于模型计算出来的一系列数据表,例如,模型生命表、模型生育表等。这些都是对人口行为规律性和差异性的量化描述。这些模型式的人口理论,是人口学的学科特色。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口学者对人口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比20年前弱了一些。目前,有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中,有很多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加以检验和解释,虽然没有什么创新,但使用中国数据、文化来进行检验,加入中国元素,对理论发展也有所推动。以往的研究缺少对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沉淀,通常是就事论事的研究很多,但沉淀下来可以作为规律或理论的东西却比较少,从而缺少对话和讨论的共同标准。当今的人口学者很少有人再继续研究理论,大都是分析一些数据,这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 几个重大的人口理论问题

1. 低生育率理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是Lutz等人依据20世纪90年代欧洲生育率持

续低迷的情景而提出的理论,他认为生育率一旦低于 1.5 以后,会越来越低,以致长期性低迷,如同掉入陷阱,很难再回升。但是,最近几年欧洲很多国家的生育率都在回升,所以对这个理论的讨论和质疑就多了。它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长期的趋势,非常值得研究,它对判断中国未来生育率走向和长期趋势非常重要。然而,从总和生育率回升的程度看,日本是 1.4,法国是 2.0,其他国家没有超过此水平。这说明还是低生育水平。中国如果低生育水平一直持续下去,那么中国人口持续减少是必然的。人口减少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2. 人口经济理论。美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增长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影响,对人们生活总体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对劳动生产率没有降低的作用。这个结论与我们以前的认识和理论很不一样,那么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究竟是什么影响,影响巨大还是影响微弱,值得认真思考和讨论。

人口和经济的关系从来没有一致的结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期是正的影响,在另一个国家某一阶段则是负的影响,在其他地区又没有影响。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逆转,但由于人口变动具有累积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能很大。例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短期内很难观察到,但日积月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就逐渐凸显出来。在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时,可以选择一些具有相似背景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3. 中国人口发展阶段性理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可分为 4 个阶段:(1)人口自发增长时期;(2)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时期;(3)稳定低生育水平时期;(4)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阶段。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理论支撑。人口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可以预先估计和判断某些人口问题。然而,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是多年前就可以预计的,但没有人去认真研究。只是政府介入后,学者才开始关注。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实际上仅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70 年代初开始到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为止的以“晚稀少”政策为基本特征的尊重民众意愿、切合中国实际的以人为本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独生子女政策推行至今。尽管提出了许多口号(如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但目前仍停留在口号阶段。从科学角度考察,在强制性极端的现行生育政策下是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的。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然而,中国妇女的生育率自 1992 年进入低生育水平时代以来不断走低,与更替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 人口理论需要不断反思、重新认识和创新

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学者自己创造出的人口理论。实际上,两种生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计划生育做解释而提出来的,而不属于一般的人口理论,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政治需求下所产生出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决定实行计划生育,同时发现马尔萨斯也是主张实行计划生育。为了使计划生育能够在政治上站住脚,必须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

里找依据。当时的学者不可能从一种中立的角度来研究人口理论,只能是在给出结论后为其寻找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说过要控制人口,他们只是提出两种生产要相互适应。中国计划生育道路走到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重新反思,到底两种生产理论对还是不对。通过实行避孕节育来推行计划生育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延续;而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释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在解决人口问题上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是完全对立的,硬说计划生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有些牵强。

此外,一些经典的人口理论需要不断研究和重新认识。比如人口转变理论认为,死亡率先下降,然后生育率下降,二者的时间差导致人口增长。但有研究显示,利用17、18世纪各国早期人口数据,把一个国家的出生率、死亡率两个指标数据标注在二维坐标图上,结果发现很多地方不是死亡率下降在先,而是生育率下降在先。另一个例子是经典人口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下降,以往人口转变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到了低生育水平阶段,这一理论就不适用了。比如,社会经济更发达的西欧和北欧生育率更接近更替水平,而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的南欧和东欧生育率反而特别低。美国的生育率还在更替水平附近,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相对更低。东亚成了极低生育率的密集地区。

二、关于人口政策问题的讨论

(一) 人口政策研究必须基于正确理论指导

有学者认为,所有的方法、政策都源于理论的指导,理论不正确,后面的一切(包括政策)都不正确,人口政策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我们以往的政策受理论局限性的影响太大,理论上长期困扰在数量对比上,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数量对比,以致政策也就一直在数量上做文章。而马克思说马尔萨斯恰恰是抽象的数量对比,他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规律。目前人口学界在谈人口政策时还局限在人口数量这个角度,就生育政策争论生育政策。生育政策调整只是人口政策的一个部分,人口决策需要跨领域、跨学科的考量,采取的措施必须是综合、长期、全面的。人口政策选择与制定需要以正确的事实和价值判断为基础,价值判断的作用大于事实判断。

在研究和讨论人口与社会政策如何更好地适应时,有3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一是调整社会经济政策,使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去适应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变动,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经济政策服务于人口需要”,这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二是调整人口政策,使人口变动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与分布等的要求,也就是“人口政策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这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三是上述两种视角的综合,既考虑到对经济社会做出必要的调整,适应人口发展的要求,又考虑如何改变人口走向,以便更好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在讨论人口政策调整时,不仅要考虑到人口变动如何更好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更要从人的基本权力角度考量。任何社会政策及其调整都应在遵循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未来的人口与社会发展应该是双轮驱动。一是人口政策需要调

整,二是人口政策调整不仅要立足于今天既有的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与分布,更要考虑到这种调整对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

(二) 老龄社会需要社会、经济和政策的改变

中国的人口不会再度年轻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是必然的,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都要进行改变来适应这样一个社会。现在的生育政策无论怎么调整,对中国未来的老龄化的影响只是延缓老龄化进程,降低老龄化程度,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生育政策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老龄化作用,有利于应对未来老龄化,缓解这个过程。但从应对人口老龄化角度,更需要从经济、社会、制度的设计上进行重大调整和改变。老龄社会与年轻社会、增长型社会不同,除了延长退休年龄、放开二胎政策,我们应该改变思路,再考虑制定一些家庭政策。因为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细胞,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留守儿童、流动家庭、留守老人还有失独家庭等,包括养老、育儿、生育成本太高的问题等都与家庭密切相关。如果鼓励家庭维持在一定的规模,可能对经济社会都有很大好处,关键是能不能维持住一定的家庭规模。制定有利于家庭发展的政策,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政策内容。总之,人口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制定涵盖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政策。

三、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一) 注意人口学模型、指标与理论的内在关联

人口学的模型、方法和指标与人口学的理论密切相关。方法的正确使用和创新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有的框架模型既是方法也代表理论视角,如人口统计学里的生命表、邦戈茨的传统生育因素模型中都推出了规律性的东西,它们代表了人口发展中的共性特征,基本反映了人口按一个理想模式发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人口学方法还涉及大量理论问题。如生育的进度效应,本质上源于按队列假定从时期年龄别生育率推算终身生育水平。人口预期寿命的计算同样涉及时期年龄别率按队列假定来推算终身水平,也存在进度效应。在研究生育水平时,时期指标和终身指标这两种不同的测量还有很多讲究。在人口转变期间,生育模式也会变化,时期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在水平上往往不一定重叠,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时期进度效应。

有学者指出,政策模拟中要注意时期总和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的关系。比如,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可能波动很大,但对一代人的终身生育率没有太大影响。终身生育率可能不会很高,但某一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却可能很高。如三年困难时期对1962、1963年的总和生育率影响很大,但对终身生育率却基本没有影响,所以总和生育率可能会产生误导。而队列的方式能真正模拟人口的变化,比如该队列放开了单独二胎,干扰的因素可相对纯净,然后回推总和生育率,再做人口预测。政策只会控制终身生育率,本意并不是控制时期总和生育率,时期总和生育率的跌宕起伏对终身生育率没有太大影响。

（二）人口模型、方法及实际应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比较适用、更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是邦戈茨的低生育率模型。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与高生育率因素有很多不同。低生育水平如何反映,本身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它由社会理想子女数、个人的生育意愿、个人的生育计划、个人的实际生育安排、实际生育结果这些一环套一环的关系构成,形成了人口统计的很多关联的指标,它们之间相关,但并不等同,数量水平不一样。从宏观的社会理想子女数到微观的生育结果,再到宏观的出生水平和生育水平,这些环节都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但是,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及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否则无法使我们观测和分析聚焦,这就是框架模型的理论指导意义。另外,马瀛通等中国学者创建的递进生育模型也比较有应用价值。目前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是假如放开二孩生育会有多少补偿出生,研究这一问题除了使用二孩递进生育模型外,还涉及上述理想子女数到实际生育结果之间的各个环节,而这些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完全把握,还有很多问题必须通过实践结果来研究分析。当前“单独”夫妇政策的放开就是一种的实践,有助于检验我们以往的认识是否正确。

我们的决策很依赖人口预测模拟,但以往的预测模拟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有很多简单化的假定,原因是过去许多方面的信息是空白,没有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结果,但是,能做的研究还要尽量做,于是要先给出一些假定,但对于这些假设和假定,也需要重新审视与考虑。人口预测参数要尽量符合实际,要不断观察,找出规律。这次单独二孩预测用的是 60.8%(单独一孩的夫妇在最近几年要生二孩的比例),是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在全国 7 万户的调查得出的。这不是生育意愿,城市和农村的平均生育意愿大概是 1.8~1.9,叫做理想子女数。而单独一孩的夫妇在最近几年要生二孩的为 60.8%,而最终生出多少要看实际情况。最近湖北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20%左右明确生二孩,明确不要二孩的约占一半。建议在农村做个调查作为对照组。现在单独二孩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还要不断观察,从中找出一些端倪。

面对大数据时代,人口学应发挥本学科的特殊优势,人口的分析技术、人口预测与大数据接轨。结合大数据的收集、挖掘推进人口分析和预测仿真技术的发展,使之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和决策的需要。过去的预测往往就人口的参数来预测人口,但参数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被忽略了,或者说被假设、假定代替了,主观性很强。另外,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有很多中间因素,实际影响生育意愿的背后也有很多因素,这些因素能否通过一种科学实验的方法予以揭示,如何用多学科的方法揭示生育模式、迁移模式、死亡模式的动态演变规律及其决定因素,如何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人口数量、结构变动的经济、社会、环境效应等都值得思考与研究。

(作者:浙江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 犁)